



湛江市档案馆



湛江市档案馆



湛江市档案馆

湛江文史

吴南生题



湛江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湛江文史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湛江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六年·湛江

主 编 蔡进光
副主编 詹杨森 何罗有 林向凡
李开荣 董小华(女) 何启明
编 辑 吴宝龙

湛 江 文 史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湛江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广东省湛江嘉浩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5 字数:415 千字

2006 年 12 月印刷

政协湛江市第十届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蔡进光

副主任：詹杨森 何罗有 林向凡

李开荣 董小华(女)

委员：王立新(女) 王思娟(女) 王晓茉(女)

王小冰(女) 邓光福 邓宏森

邓培梧 冯兆平 叶志中

许巍 帅学明 孙志成

何昭阳 吴安 吴增青

李连 李赣 李国良

麦小林(女) 杨明东(女) 杨昕洪

杨高 邹仲友 陈大善

陈云(女) 陈今超 陈庚

陈洪美 陈涛 陈耀琦(女)

周凡(女) 周贝华 周军

尚劝余 林红(女) 林琳

林红卫 胡日章 徐永棠

梁友 梁康 黄艳(女)

黄妙丽(女) 谢景登 谭什成

目 录

峥嵘岁月

- 我在遂溪战斗的日子 黄明德(1)
- 再谈我在吴梅地区共赴国难的时日 黄明德(6)
- 解放前中共组织在南路、粤桂边区的局部执政 陈 充(11)
- 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成立及被破坏的经过 张 翱(24)
- 左翼文化运动在湛江的反响 张 翱(34)
- 忆“广汇行”交通联络站 沈时诚(43)
- 解放战争时期东海岛革命斗争概况 王钦进(70)
-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光料村小学 许和达(88)
- 抗战时期党组织活动据点——官渡遗风小学 陈 枫(92)
- 雷州北村老区纪事 蔡文忠(95)

政海风云

-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后的特呈岛新貌 陈 强(102)
- 中央领导情系湛江垦殖橡胶业 骆国和(110)
- 湛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陈 充(116)
- 湛江三年经济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曾广源(141)
- 湛江市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始末 郭景生(144)
- 湛江郊区大跃进公社化见闻 唐汉基(161)
-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雷州的掠影 蔡 庭(169)
- 记 1966 年湛江直属机关干部万人三百里大行军活动
..... 顾善达(174)
- 湛江军民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郭景生(179)

半岛钩沉

- 雷剧《抓阉村长》的演出与风波 卢凌日(182)
海康“仙人水”事件真相 蔡 庭(191)
震惊雷琼的“严雪假案”始末 王钦进(201)
抗战时期广州湾的社会状况 屈康慧(207)
雷州匪患期间灵界村遭血洗 林宗彦(219)
太监在雷州 李 龙(222)
汤显祖谪居徐闻时间考 黄果心(225)

行业纵横

- 湛江师院校史溯源 邓杰昌(229)
建国初期的湛江二中 谭 笑(252)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发展历程 顾善达(266)
廉江的茶叶生产 赖炳琨(275)
廉江的龟老板凉茶 钟 珠 严秋实(280)
湛江生态文明村——廉江新屋仔 黄振强(283)

民俗文化

- 湛江谚语 许和达(289)
湛江的春节民间习俗 骆国和(306)
徐闻民间文艺 吴 凯(313)
雷州的亭文化 符秉孟(325)
林召棠留墨粤西 欧 锷(328)
岭南诗人李小岩诗中的人和事 欧 锷(335)

文物古迹

- 铁耙县故址拾遗 陈小觅(346)

粤西桂东南周边市(县)出土铜鼓概述	钟 珠 严秋实 冯旦升(350)
雷州水美村文物古迹	李麟佑(362)
千年古村——湖光程村	陈小冕(372)
雷州湾双溪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	刘佐泉(375)
独领风骚的异域鎏金器	陈 成(383)

人物春秋

革命战争时期南路部份领导同志的绰号别名	陈 章(385)
难忘的战友——悼温焯华同志	黄明德(401)
光辉形像 永耀千秋——深切怀念吴有恒同志	黄明德(404)
悼念战友陈开濂同志	黄明德(408)
忆父亲陈开濂	陈 章(411)
永难忘却的怀念——缅怀陈信材同志	李华良(426)
记陈信材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活动	陈 枫(431)
前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组织部长江刺横	何锦洲(436)
缅怀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杨枝水	何佩均(441)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共产党员——容启钦	肖剑锋(449)
追忆正义中学校长王萑川	梁周容(454)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王克	符 铭(465)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舒光才	张 宏(487)
深切怀念杨子江叔叔	谭启滔(498)
把青春献给艺术 把艺术献给人民 ——怀念粤剧表演艺术家孔雀屏女士	祝 宇(507)
记木偶表演艺术家郑寿山	何锦洲(517)
缅怀情系湛江的澳门画家陆昌先生	曾广源(521)
清嘉庆间举人李羌和	李高万(525)
廉江历史名人——黎正	黎法华 黎俊生(529)

我在遂溪战斗的日子

黄明德

我在遂溪县工作前后两段时间，共三年多。第一段是1938年秋至1941年初，这段时间主要是开展农民运动，进行抗日宣传，建立农村党组织；第二段是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这时国民党大军压境，我到遂溪县参加反扫荡斗争。现就两段时间谈谈我个人的经历。

我是在1938年秋从东海岛到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工作的（会址设在遂溪县城内黄略武馆）。历史上，东海岛属遂溪县版图，互相关系密切。遂溪县开展革命活动，都把东海岛当作本县的一部份。早在抗战以前，就有许多进步青年互相来往；抗日战争爆发后，东海岛大批青年到遂溪县参加工作，这批青年后来大部份都成为党的主要领导骨干，在遂溪县起了应有的作用。我到遂溪县之前，已在东海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到遂溪县以后，参加“青抗会”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同唐才猷等同志到官湖、礼湖、礼村一带帮助农民秋收，开展抗日宣传，接着又到陈村仔、丰厚、支屋、礼埠等村庄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宣传队活动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通过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抗日道理；绘制连环漫画，揭露日寇在东北、华北等地屠杀、奸淫、掳掠、焚烧等罪行；还演街头剧，唱雷州歌，哭“东海嫁”，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建立“青抗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一、二月间，我参加了“青抗会”组织的平石岭露营，夜间行军、实弹射击，演习打游击。嗣后到遂溪县西区，并带来东

峥嵘岁月

海岛几个青年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山家村一带当组长。同我一起在山家村的有黄道修(又名黄轩)和黄克明(后脱党),曾锡驹(已病故)、陈醒亚同志也到过山家村一段时间。当时我们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办夜校,发动大批农民到夜校读书;组织“青抗会”,白天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教农民识字,不收学费,生活自理;还组织消费合作社,使农民懂得组织起来的好处,这是一个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摆脱了商人从中剥削,农民很欢迎。这样,便大大提高了“青抗会”的威信,我们说话就有了影响,不但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而且地方上一些中层人士中的中间分子对我们也表示赞同,许多群众红白喜事、日常纠纷都听从我们处理。接着,从组织农民到武装农民,把我们活动的村庄的土炮、洋枪以及国技馆的大刀、三叉、藤牌武器统统掌握起来,组织抗日自卫队,举行过几次露营,练习夜间袭击敌人的战术,还参加过“青抗会”组织的较有影响的西田岭武装大会。当时我们很注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对武装斗争较重视。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党组织。山家几条村的党支部,就是我亲自发展党员建立起来的。记得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李安同志(现在湛江化工厂工作,至1940年春节后我离开山家村时止,那里已有30多个党员。这些党员,后来在武装斗争中都成骨干,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39年秋,西区已成立党的区委会,区委成员有殷英、王玉引(后来均脱党)和我,殷英是区委主要负责人。当时活动的主要村庄除山家、山里村外,还有同文、老马、金围、斗仑、安塘、北潭等村庄。

我离开山家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反共高潮的到来。当时,山家村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地方人士,如李广培、李广渊、李广泉、李昌堂等人起了变化。特别是山家村有一个叫李龙文的,原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他在武汉(或长沙)被日寇打散逃跑回来后,经常散播恐日论和投降论,我们同他针锋相对,大力宣传持久

战抗日道理。后来，他处处发难，说我是共产党，利用宗族关系，煽动群众不参加夜校，唆使一些落后群众离开我们。同时，杨柑小学校长李品三也开始恐共、反共，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起来。当时，山家村的群众怕李龙文对我下毒手，夜间总是带着大刀、三叉、藤牌在我的周围睡觉，暗中保护我。针对这种情况，组织上便决定把我调离西区，到东区的黄略、麻章一带工作。当我准备悄悄撤离山家村时，群众知道了，纷纷前来挽留我。但组织上已经作了决定，非撤退不可，为了安慰群众，我只好说是到遂溪县“青抗会”开会。我到了东区后，山家村的群众还到县“青抗会”催我回去，“青抗会”的负责同志婉言说服了他们。在西区的斗争中，我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得到锻炼，也经受了考验。更可喜的是建立了农村党支部，为遂溪建党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到东区工作，正处于反共逆流时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党员，巩固原有组织，同时谨慎地发展新党员。那时，东区约有80多个党员，他们都团结着广大群众，群众基础比较好。我没有什么公开的实际职业，只是在双港村一个叫陈华生的资本家的家里（此人在赤坎当经纪）做一个挂名的家庭教师来掩护。这个区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的有甘林、黄略、丰厚、陈村仔、支屋、九东等村，在赤坎学校中也有一些学生和教师党员。东区当时党的区委会成员初有黄景文、黄桂（已牺牲），后来陈明景同志也参加区委，我担任区委书记，直到1941年初我调离遂溪县时止。在这期间，反逆流斗争很激烈。国民党叫喊要解散“青抗会”，声言要抓拿共产党员。我成了国民党的所谓危险分子之一，因此在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解散“青抗会”的时候，出入都带着手枪，加强自卫。这时，有的人动摇害怕，借故回家不敢归队。为了反击逆流，遂溪县委用“青抗会”名义在黄略村小学附近召开了一次反汪肃奸万人大会。我们除了发动全区主要村庄的群众带着武器参加大会外，还专门布置陈明景同志代表农民在大会上演说。我也

在大会上哭“东海嫁”，痛骂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群众听了很高兴。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首“东海嫁”是这样的：“姓陆县长名声臭，全县人民气难消；投靠汉奸反抗战，枉食人民饷和粮。”这次大会吓怕了遂溪县国民党县党部部长，据说国民党开列了许多黑名单，要大举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干部都撤离遂溪县。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离遂溪县，去负责化州县的工作，后又调到吴川县和梅菪市负责工作的。

我第二次回到遂溪县工作大约是在1945年8月下旬。这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时，我还在现湛江市郊区坡头、南三岛治病，组织上通知我从南三岛到遂溪县东区田头、茅村、边坡岭一带继续疗养，协助沈汉英同志做些工作。不久，听说国民党大军压境，在中区（洋青一带）扫荡频繁。这时，沈汉英和支仁山、邓麟彰等同志找我谈话，要求我往中区负责反扫荡斗争。他们说：“目前形势很紧张，上下关系准备随时切断，各个区都要独立作战，现在要做好这个准备。”当时，我虽然感到力不从心，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意见，带病到中区赤泥地一带，找到陈拨同志，接上关系后，立即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全面工作由我负责，陈拨、陈伟荣同志协助我分管一些地方。那时，老一团正在准备撤退，我们通过风朗村的党员了解飞机场的情况，配合老一团袭击了飞机场。袭击了飞机场以后，敌人扫荡更加猖狂，每天都有被敌人围捕、屠杀、烧房屋的消息传来，真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针对敌人的反革命暴行，我们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一、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鼓舞士气，坚持斗争；二、撤退红色（即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掩蔽灰色（即尚未暴露身份）党员，保存力量；三、开展锄奸活动，镇压一些反动的乡、保长和地富分子；四、搞好情报工作，及时通知群众回避、转移，以减少损失；五、开展小股武装活动，迷惑敌人。当时，中区还有一个中队武装，负责人是梁怀明（梁立）同志。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敌人周旋了

峥嵘岁月

几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在外村塘杨恒仁同志(已牺牲)家里和陈拨、陈伟荣同志开碰头会,被敌人发觉包围。我们冒着敌人密集的轻机、驳壳、步枪子弹的扫射,突围出来,大家都平安无事,只有我跌伤了手脚,还吐了血。当夜,我们又撤退到陆屋村田边的地洞里休息了几天,继续开展斗争。在这场惊险剧烈的斗争中,党员、干部群众都很坚定,没有发现叛党投敌行为。

中区反扫荡斗争稍缓和一点时,组织上又通知我回到东区,说东区负责人沈汉英同志要调到别区工作,要我负责中区和东区的工作。约两个多月后,为了适应当时反扫荡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区和东区又分开,东区由我负责,先后有梁华栋、梁立、杨华汉等同志协助我工作。那时,东区还有一个手枪队,全区的情况比较稳定,除了做好上述的几项工作,保存原有力量外,还从斗争中培养、考验建党对象,吸收了一些新党员,开辟了一些新村庄(即过去没有开展革命活动的村庄)。在东、中区统一又分开这段时间里,做了大量的撤退干部、保存武装力量、巩固组织、扩大和恢复活动地区的工作,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六月间,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这时,我的身体已逐步好起来了,组织上便决定将我调离遂溪县,去负责廉江县的工作,同时兼管分散在广西博白、陆川、玉林等县的南路党所属的组织,开展这些地区的工作。真是“战衣未脱蒋军至,再战边疆饮血盟。”

(作者系原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湛江地区行署专员、省顾委委员)

再谈我在吴梅地区共赴国难的时日

黄明德

我是1941年9月份从化州县调来吴川县、梅菪市、化东南、茂南等地区负责工作的。那时正是皖南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所以我来这些地区时党组织都已转入地下分散活动，没有党委，我任特派员，全权负责工作。1942年卜国柱调来当第二特派员。1943年夏，他病逝，仍然是我全权负责工作。

1943年秋，为了加强抗日前线的领导，我管的地区划分为两个部份，吴川县成为一个地区，由温焯华同志直接领导，王国强、黄景文同志分别管理；梅菪市、化东南、茂南和吴川一些边境成为一个地区，由我领导。

现在回想起当时险恶的环境，艰苦的斗争，同志们为国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人民群众的高度爱国热情，真是感慨万千。

(一)

我领导的地区党员分布较广，大部份的区、乡都有党员，多则六、七人，少则一、二人。那时地下党活动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我初到梅菪市时，就同一个做小贩的党员张瑞麟在一起，以肩挑煤油串街叫卖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后来我又通过梅菪市窑地一个姓陈的工人党员的关系进窑地做搬泥苦工，不久又到振文圩同农民党员潘日生开缸瓦店，和高岭村的几个农民党员在梅菪市开腊肠店。总之，一切为了在当地站稳脚根开展革命活动，再苦再累再难的事我和我领导下的党员也心甘情愿干。

因为环境恶劣,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经常变换住地,有时住在这里,有时住在那里,住得最多的是梅菪至黄坡的渡船上。后来经过细心选择,我相对稳定地住到党员梁毅同志父亲开的汉记草纸铺和梅菪头村梅中党员学生周亮、陈志诚同志的房东晚嫂的家里。这两个地点成了我们临时办公的领导机关。

外出活动危险性很大,为了躲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跟踪,我一日几变,根据接头的不同对象,随时变换身份,有时是学生,有时是教师,有时是商人,有时是小贩。直到1943年秋我才到茂名县三民乡中心小学(现是吴川县长岐镇良村小学)当个挂名教师,自此我们的领导机关就搬到那里。

当时党的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根据党这一方针来开展革命活动,在发展新党员和接收老党员的工作上都十分严格。在老党员中如果发现有政治嫌疑,马上切断关系,就是没有政治问题,如果思想动摇,消极怠工,自由撤退,不积极寻找组织,或社会关系复杂,作风不好,也不承认其党的关系,把他们当作共产主义同情者来对待。当时梅菪市就有几个老党员是因这样的情况脱离了党的关系的,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政治问题,后来都恢复了他们党的组织生活。

因为地下工作要求严格,我们发展党员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都能在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上起到重大作用。当时为了把人民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发展抗日救国力量,我们规定每个党员都要同非党群众交知心朋友,绝大多数党员都很好地完成任务,有的交十多个朋友,有的交三、五个朋友,使我们的抗日救国力量有很大的增长,这是我们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能够开展得轰轰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40年代初,吴川县、梅菪市、化东南、茂南等地的抗日救亡群

众运动都蓬勃开展，很有规模，特别是学生运动更是汹涌澎湃。当时在梅县的梅中和吴川世德中学，堪称革命摇篮。梅中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庞谦之、周亮；世德中学党的主要负责人是陈献、李雅南；此外在吴阳中学和在黄坡的川西中学，梅县的六堡中学，塘 的吴川师范，茂名的公馆中学，都有党的活动。还有 20 多间小学也有教师党员、学生党员，其中吴川县大垌、大路、翟屋、泗岸、上杭等村小学和世德小学、川西小学、茂名三民乡中心小学和博铺、沙美、郑山、飞马、兰石、高罗等村小学，化州县山口、黄岭等小学，党员和进步教师较多，他们都能起骨干作用，广泛发动和领导各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团结抗日，反对投降，打倒汉奸卖国贼！在这个口号下，我们广泛地团结了教师、学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为后来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做好组织准备。

在农村我们提出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苛捐杂税；在工厂提出反压低工资，反无理殴打开除工人；得到工人、农民的热切拥护，城乡的“姐妹会”、“国技馆”等进步群众团体迅速发展开来，共同的革命目标，使学校、农村、工厂的革命力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重要力量。

在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同时，我们还十分重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除了与张炎将军合作抗日之外，我们还对当时的区、乡、镇长和保、甲长，以及学校的校董校长和开明人士做团结争取的工作，使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国民党基层政权机关掌握部份权力和自卫队武装，扩大抗日力量。例如我们的郑奎同志出任茂名县飞马乡乡长，李雨山同志出任茂名县三民乡副乡长，杨子儒同志出任吴川县通津乡乡长，郑世英同志出任梅县警察局警官。他们都在发动抗日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詹式邦任国民党吴川县县长之后，吴川绝大部份的乡长和自卫队长，都是由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这对后来我们

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回击国民党投降派的挑衅提供了人力物力的保证。

(三)

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处处迫人，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建立独立自主武装，领导人民抗日到底的指示，在中共南路特委的领导下，我们与张炎将军合作，于1945年1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起义前我们做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普遍建立地下游击小组，通过在国民党基层政权任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掌握一批武装，把城乡国技馆控制起来掌握一批民间武器，为建立抗日武装队伍作充分准备。

起义以吴川为起点，我当时领导的地区起义比吴川起义迟一两天时间。我领导的起义指挥部设在茂名县三民乡中心小学（现是吴川县长岐镇良村小学）。我们原计划组建三个大队，梅菪市和博铺、覃巴组建一个大队，大队长拟由庞谦之同志担任；化东南和茂名县的龙首、三民、横溪组建一个大队，大队长拟由李一鸣同志担任；茂名县的公馆、袂花、鳌头、飞马、兰石等地组建一个大队，大队长拟由郑奎同志担任。大队政委均由我担任。后来，由于一些地方准备不足，情况变化，大规模起义时只组成一个大队——南路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我任政委，初时大队长是李一鸣，副大队长是李雨山，不久南路特委派梁宏道、程耀连率领武装较好的一个中队到化州的牛湾、双牌乡同我们会师，队伍整编后，梁宏道同志任大队长，李一鸣同志任副大队长，我仍任大队长政委，李雨山、程耀连、梁儒杰、陈可楷等同志分别任各中队长。我们的大队在建立初期有500多人，经过几次战斗和整编后还有400多人。

我们的大队在化东南和长岐三民乡一带活动，考虑到这些地

方毗邻梅菉、化州、高州、电白，四面受敌，经过几次战斗后转移到吴东北南巢休整。这时我患了重病，由组织派人护送我离队就医，第三天部队便不幸遭敌人袭击，大队长梁宏道在突围时渡河牺牲，还有一批同志英勇捐躯。后来我们大队由李一鸣同志重组，与王国强大队并肩战斗，在进军茂西（即茂名西部）的战斗中再受严重挫折，陈以铁、苏少琬等一批同志壮烈牺牲。

现在回头总结抗日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们的失利，一方面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对形势估计和经验不足。但是这次起义经过多次战斗，转战了不少地方，既锻炼了大批干部，又广泛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的革命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

最后说明一点，上文谈及有关吴川的情况，是我领导的地区包括吴川时的一些情况。

（作者系原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湛江地区行署专员、省顾委委员）